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

张文诺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从解放区文学开始,会议开始大量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是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合法性的叙事。十七年文学呈现了大量的会议场面,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书写现象。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为十七年文学带来了非常独特的印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重大的社会变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提供了那个时代人们较为真实深刻的心理变化镜像,为那个政治性的时代提供了形象的注脚。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会议;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6-0053-07

从解放区文学开始,会议开始大量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世界之中,开会成为解放区小说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并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突出的书写现象,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学中的会议文化。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来看,会议与中国革命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同构关系。会议在革命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甚至扭转乾坤的作用,“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中共“七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共“八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会议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革命事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起到了决定命运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些会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革命作为一种理念,在转化为行动并进而进入文字成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候,叙事者所要做的是:必须把那些‘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情景与话语宣讲,不失时机地搬上历史的舞台,并且还要把这些情景充分地加以‘神圣化’,以强化对革命的合法性的阐述以及对受众的幸福承诺。”^[1]作为革命与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会议也必然被革命作家写进革命文学之中,成为革命叙事的一部分。“写作或写作的优先地位仅仅意味着一件事:它绝不是文学本身的事情,而是表述行为与欲望连成了一个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然而,表述行为本身又是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2]革命叙事不但要“客观”地记录革命历史,还要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重新想象历史。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革命叙事,继承了解放区文学的写作方式与创作经验,不但要呈现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要对读者给以未来的美好承诺,来建构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自然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大量的开会情节进入到十七年文学之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书写现象。

一个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然而,表述行为本身又是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2]革命叙事不但要“客观”地记录革命历史,还要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重新想象历史。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革命叙事,继承了解放区文学的写作方式与创作经验,不但要呈现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要对读者给以未来的美好承诺,来建构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自然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大量的开会情节进入到十七年文学之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书写现象。

一、会议何以进入文学

其实,就文学中的会议书写现象来说,尤其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会议书写也并不少见。在《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明英烈》等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中,就有非常精彩的会议书写。尤其是《三国演义》,作者多次写到两军开战前的会议场面,比如写孙权与周瑜商议破曹的那段会议书写就非常精彩。

次日清晨,孙权升堂。左边文官张昭、顾雍等三十余人;右边程普、黄盖等三十余人;衣冠济济,剑配珊珊。分班侍立。少顷,周瑜入

【收稿日期】2017-05-2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当代小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立项号:2016J056)

【作者简介】张文诺(1976—),男,山东省阳谷县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见。礼毕,孙权问慰罢,瑜曰:“近闻曹操引兵屯汉上,驰书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权即取檄文与周瑜看。瑜看毕,笑曰:“老贼以我江东无人,敢如此相侮耶!”权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与众文武商议否?”权曰:“连日议此事:有劝我降者,有劝我战者。吾意未决,故请公瑾一决。”^[3]

这是孙权方面商议军国大事最高级别的军政会议,面对曹操大兵的威胁,江东孙权既不甘心投降,又担心抵挡不住曹操大兵,难以决断,因而孙权召开军政会议,请周瑜做最后的决断。作者以简练的语言写出了最高军政会议的恢弘与盛大,烘托了封建君王的威严与气势,同时也写出了东吴主帅周瑜轻松洒脱、胸有成竹的风采,很见艺术功力。

五四以来,文学提倡写普通男女的悲欢,“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4]文学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会议作为一种具有宏大意义的现象淡出了文学视野。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以来,会议成为中国革命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为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召开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开会逐渐成为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会议’这一新文学意象生成的历史,与中国革命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概言之,在进入20世纪以后,由早熟的民初议会政治激起的民众爆炸性政治参与热情,使得‘开会’成为人们参加公共生活的家常便饭。”^[5]主流文学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中国革命进程,作为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会议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文学之中。

解放区小说表现了大量的会议场面,会议在小说情节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议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环节,甚至可以认为小说情节是对会议内容的演绎与注脚。比如在土改小说中,工作队每到一个农村,工作队成员先开一个小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按照计划深入到农民中间,发现先进分子,然后再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土改,接着开斗争地主大会,农民分到了土地、浮财,最后召开庆祝大会,小说在庆祝大会的欢乐、喜庆的气氛中结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富强以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是在一种与历史上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完全断裂的状态下进行的,这自然会引引起还没有摆脱传统生产关系的人们的心理动荡与心理焦虑。为了动员普通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频繁地召开群众会议就成了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撰,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6]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必须建构群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对工人、农民进行思想改造。“‘十七年’小说有其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变,生活背后的观念与伦理也在变。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伦理,多是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以大叙事的方式为一种新生活的出现辩护,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社会改造而助力。”^[7]主流作家敏锐地发现了开会这一政治与生活现象,并把它作为主要情节写进作品,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开会意象。会议书写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鲜明特征,会议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的突出内容,在十七年文学中成为结构小说的最关键一环。

会议书写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非常突出的内容,尤其是长篇小说描写的会议次数非常多,《山乡巨变》中的会议最多,有24次,《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乘风破浪》《林海雪原》《红旗谱》《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等每部小说描写的会议都不下10余次。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不但次数多,而且种类也多。有大会,也有小会,大会前有小会,小会前也有大会;有党员会,群众会;有党委会,党委扩大会;有宣传会、动员会、商议会、批判会、庆祝会。会议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十七年文学往往以会议为叙述的起点,中间穿插大大小小的会议,在情节的发展与高潮时都有相应的会议召开,最后以庆祝大会结束。十七年文学以会议作为叙述的起点,奠定了叙述的格局与基调。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就是从县委会议开始的。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书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吵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8]

短短的几行文字写出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次县委大会是在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人数多,参加的人员达到成千;持续时间长,会议持续了九天。人数多、时间长说明会议

的议题之艰巨与重大,正是在这次大会的号召下,清溪乡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样的开端暗示了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从参加会议的干部的乐观态度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必将取得成功,整部小说充满一种明朗、乐观、热闹的基调。

十七年文学处处突出了会议的作用,每到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或者说工作难以推进之时,就要召开会议予以解决。长篇小说《三里湾》写了三里湾村的秋收、扩社、开渠等几件关系合作化运动的大事。在党的领导下,秋收工作顺利结束了,开渠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原因是开渠需要从糊涂涂家的刀把地上通过,而糊涂涂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拒绝水渠从那块地上通过,要想开渠,必须让糊涂涂入社。而糊涂涂不入社的理由是他怕老婆,他做不了他老婆的主,这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他受到村主任范登高的暗中支持。要想开渠,必须让范登高入社,必须解决范登高的问题。范登高是村主任,他头脑灵活、家境殷实不愿意入社,范登高的问题是开渠的最大障碍。那些不想入社的群众都拿出范登高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为了解决范登高的问题,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决定召开整党会议,经过党内的严厉批评,范登高被迫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态度,“主动”带着自己的两匹骡子入社。范登高入社以后,糊涂涂失去了庇护,考虑再三,也答应入社,三里湾农业社顺利开渠。正是几次分家会议,消解了糊涂涂在家庭中的权威;正是几次整党会议,逼迫范登高改变了错误思想,三里湾的扩社与开渠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开会的确在建国后的群众日常生活中起关键的作用,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并赋予其以神圣的政治意义。主流作家把开会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一是可以充分刻画人物的性格,在会议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通过人物在会场上的表现可以刻画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二是可以赋予作品以政治意义,“如果抛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背景,《三里湾》就是一部描写农村家长里短的小说。”^[9]开会赋予了《三里湾》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渲染了小说的重大时代意义。

在十七年小说中,我们看到,会议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开会成为人们日常的公务活动,那时的普通群众除了劳动,就是开会。经常开会的群众是先进分子,这些先进分子对那些不经常参加会议的群众形成一种优势。不但在会上讲话的人拥有公权力,即使是参加会议的先进分子也有一定的公权力(相对于普

通群众)。思想单纯的青年男女都愿意开会,一是开会可以增加互相接触的机会,增加情感的慰藉,陈大春、盛淑君、王玉梅、范灵芝、焦淑红、秦德贵、李少祥等都愿意开会,梁生宝通过开会的机会接近改霞,陈大春通过开会,对盛淑君加深了了解;二是开会属于公共事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共事务优于个人事务。经常开会的人在各方面受到重视,经常开会的人不但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在家里也有较高的地位。孟祥英因为经常开会,她婆婆不敢像以前那样欺负她了。一个人经常开会,接触的新事物比较多,所以见识也就广,个人的能力相对较强。王玉梅聪明、干练、热心公共事务,在与未来公婆的斗争中,她以理服人,说服了自己的哥哥王金生,既掌握了小家庭的主动权,又赢得了未来公婆的谅解。她的能力与她的聪明、干练有关,也与她经常开会有关。十七年文学反映了建国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开会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开会把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部分,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把连贯的日常生活碎片化,并把庸常的生活神圣化与政治化。

二、会议空间的中心化

开会在建国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并成为普通群众参与公共生活的主要形式。建国后,普通群众对于新中国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在日常生活方面,普通群众的思想并不一致也不纯洁,开会就是要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对先进思想进行宣传,因而,会场内充斥着矛盾与冲突。与其它空间相比,会场空间“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0]会场空间不是随便布置的,而是精心设计与规划的,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意。可以说,“开会成了集体教育的有效方式,改变农民传统的散漫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放松和休息。开会无非是进行政治政策宣传鼓动、针对与群众利益相关事件的集体讨论,同时会场也必然会成为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种矛盾集中展露的地方。”^[11]从会场空间来看,会场空间的规划具备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与权力隐喻。

相对于其它空间,会场一般都位于空间规划的中心。清溪乡的会议地点是清溪乡政府会议室,作者没有直接说明清溪乡政府所在的位置,不过我们可以从语境中推测出乡政府的位置,“从各个村口,各家屋场,人们三三两两地往乡政府走去。”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乡政府应该处于全乡区域的中心,距离各个村子都不太远。三里湾村的会场不在村庄的几何中心,而在权力中心,三里湾村的会议场所旗杆院位于村子的东南角,旗杆院是汉奸刘老五的房

子。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后来被政府没收,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等都在那里,村里的党员会议一般就在北边大厅西头的套间召开。因为旗杆院聚集了村子的所有公共资源,三里湾村的村民的日常生活与这里紧密相连,这里是村子的传统权力中心。“中心不仅是一个空间设置,还是意识、注意力的建构。从社会活动的层面上来说,中心是备受关注、资讯密集、不断形成叙事的区域,而边缘、角落、缝隙则意味着处在社会注意力的外围,是必然被忽略的地带。”^[12]在工厂,开会会场一般在大礼堂,大礼堂是工厂的公共空间,一般位于工厂的中心区域,大礼堂周围有工人俱乐部、商店、篮球场等,它既是工人看戏、看电影、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工厂召开工人大会、宣布重大决定的场所。

在会场空间的内部,无论是大礼堂还是小型会议室,会场内部都有一个中心区域,大礼堂的中心区域是主席台,小会议室的中心区域是会议室的中间区域,请看清溪乡乡政府会议室的布置。

这是这个祠堂里的一间最熨帖的房间,面着地板,两扇闭了纸的格子窗户朝南打开,一张双幅门通到享堂。屋里,右首白粉墙壁上有两个斗大的楷书大字,一个是“廉”,一个是“节”。房间当中摆着两张并起来的方桌子。桌子上放着两盏玻璃罩子灯,一口白漆小座钟,白漆掉了的地方露出了生锈的铁皮。桌子的周围,墙壁的近旁,横七竖八,放着好多椅子、高凳和长凳。打牌的、看书的,都围在灯下。昏黄的灯光映出的一些巨大的人影,在白粉墙上不停地晃动。^{[8]28}

两张方桌子并起来摆在房间当中说明这是房间的中心区域,党支部负责人坐在桌子的中间,其他干部按顺序围坐在桌子周围,一般的党员或者群众坐在墙壁的近旁。群众大会一般在礼堂或广场,群众大会的会场都有一个主席台,主席台的位置高于会场的其它区域的位置,领导人都坐在主席台上。一般党员或群众坐在台下,而站在主席台与听众席之间区域的人是被批评、批判或者斗争的角色。在开整党会处理范登高问题时,范登高就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群众席中间。当范登高发言时,他走上主席台但站在主席台的一个角落发言,发言位置就暗示了他被批评的角色。在斗争落后分子或者地主时,这些被批斗对象都站在这个区域,意味着他们不是领导者,也不是群众,而是“我

们”以外的人。不论是大会场还是小会议室,都要营造出一个中心,党的支部书记居于这个中心,他可以自由地观看到会场的其它所有区域,中心位置给了他自由观察他人的权力与机会,他可以自由地观看参与者的行为举止。中心位置不单单是一个空间的安排,它的确能赋予观察者看的权力,他可以自由地观看别人。“看的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语境之中,或者说,看本身就是一种交往性的社会行为。”^[13]看的行为不是一个人用眼看的行为,而是一种隐含了权力的视觉行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很多关于视觉行为的规范,它规定了谁可以看,谁被看,怎样看,看什么。在台下的听众或者是非中心的听众处于被看的位置,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被观察、被监督的状态之下,如果他有不当的行为,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被中心的人发现。“看与被看表示一种等级关系:注视的主体高于注视的客体。”^[14]视觉权力与地位、权势、性别、年龄、文化等差异有关,地位高的可以自由地观看别人,男性可以大胆地观看女性,年龄长的人比年龄小的人的目光自由一些。观看是一种社会行为,里面蕴含着意识形态。讲话位置体现权力意志的属性,当然,如果主持者或者讲话者讲话经验不足,居于中心反而可能产生紧张、局促不安的心理。比如邓秀梅第一次给清溪乡的党员们开会,由于初来乍到,她感到非常紧张,局促不安,难以控制会场局面。不过,邓秀梅毕竟有乡党委书记的底气,她很快适应了会场的气氛并自由地讲起话来。

从会场空间内部布局来看,会场是充满着权力与压抑的紧张空间,处处显示出权力的眼睛。“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15]会场空间的规划设计隐含了隐秘的权力机制,对于参加会议的个体来说,他会不自觉地感受到空间对他的规训,他也会自觉地遵守空间的规训机制,不自觉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塑造和控制。“对个体而言,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不停地监视和规训。”^[16]正是在开会之后,党与政府的政策得到了贯彻与落实,干部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先进分子得到了鼓励,一般社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落后分子受到了批评甚至惩罚。

三、会场话语模式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打江山”转向了“建江山”。打江山难,建江山更难,因

为问题往往出现在“革命后一天”^[17]。在革命战争时期,艰难、危险的战争状态使人们对物质、情感的要求极低,战争时期的人们很容易满足,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以让人们的精神处于长期的兴奋状态。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了生命的威胁,庸常的日常生活极容易让人心生懈怠、惰性,经历了革命的人们也有权力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想让人们继续保持一种精神的亢奋状态,必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会就成了最好的激励人们精神状态的方式。

开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向群众传达党的要求,激励群众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火热的建设生活中。动员群众,简言之就要培养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也就是培养群众的主体意识,让群众成为全新的政治主体。“尽管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工农的‘主人’的承诺未必都被完全兑现,但是这一努力也并为终止。且这一努力也一直获得文学的积极响应。”^[18]从十七年文学中不难看出,小说大都以动员会作为叙述的起点,而动员会的实质是建构群众的主体意识,就是激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可以得到土地、浮财,工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在建设时期,农民、工人应该可以得到他们盼望已久的更多的物质实惠,况且,这也是当初他们参加革命时革命给他们的允诺。然而,建国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焦虑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都在提倡一种片面重视生产的伦理,只要生产,不要消费;生产最光荣,享受最可耻,哪怕是有一点想法都不行。梁生宝因为忙于生产,他个人的任何生活包括爱情也被放弃了。李少祥学习炼钢之后,新的生活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他,以至于他连一天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休息。秦德贵忙于炼钢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的恋爱。王金生、王玉生、刘雨生、萧长春等一心扑在农业社的工作上,忘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不否认,五十年代的确有这样公而忘私的先进分子,但是对普通群众来说,要长期保持一种公而忘私的热情是非常难的,为了让普通群众保持忘我的工作热情,必须利用开会激发群众的革命理想、工作热情。开会时,一般首先宣读上级的有关文件,然后是以具体的事例形象生动地说明道理,从会议话语来看,会议中充斥着套话与响亮的词语。

王金生说:“这次会议是个小整党会议,可能在一两天以内开不完!大家要耐心一点!”这句话在登高听起来就是个警报。他历来就

怕提“整党”,更怕一连整好几天。金生接着说:“县里原来决定在今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才整,可是有些不正确的思想已经阻碍着现在的工作做不下去,所以昨天晚上才和县委刘副书记决定先整一整最为妨碍工作的思想,等到冬天再进行全面整顿。现在先请刘副书记给大家讲一讲!”接着便是老刘同志讲话。老刘同志仍然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讲起。^[19]

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很多都是上级文件上讲的套话、官话,但这些套话却有很大的威力。“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提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20]不管是邓秀梅、王金生、老刘等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他们的讲话中都充满了宏大词语与套话,比如整党、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违背党的政策、脱离群众、生产合作社、大跃进、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个人突出、爱摆老资格、脱离政治、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这些词语与套话对某些听众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范登高认为这些话是“紧箍咒”,一听到就头疼,等老刘讲完话,范登高搔了搔头暗自说:“天呀,紧箍儿越收越紧了!”因为有这些大帽子,范登高自己站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刚说一句就让别的社员给呛了回去,他带着乞求的口气说:“可是你也得叫我说话呀!”他发言完毕之后又遭到众人的批驳,乐意老汉认为范登高是在向地主刘老五学习,乐意老汉的言外之意暗示范登高是新时代的刘老五,这彻底否定了范登高发家的合法性。在《乘风破浪》中,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严肃批判冯棣平的错误思想,康伯和批判了冯棣平在工业上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思想,老工人刘进春警告他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钱友太揭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话不但沉重打击了冯棣平,而且也打击了宋紫峰,宋紫峰也自觉地反省自己的错误。生产一旦下降,市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成立临时指挥部,要求各级主要领导人开会,检查一下领导思想,解决企业内部的思想问题,完成增产任务。这些宏大词语与套话对先进群众却有一种激励作用,它让先进分子从中受到无形的支持,获得精神上的鼓舞。大会一结束,先进群众的士气能持续好一段时间。自从参加市委扩大会议回来以后,李少祥心情爽快,浑身是劲。

这些宏大词汇与套话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目的是为了确立群众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帮助群众树立国家主人翁观念,就能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要将社会主义变成为农民自身的内在要求,必须创造全新的中国农民形象,使其成为新的农村变革中的真正主体。”^[21]“主体建构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还不至于此,再推进一步,我们用以判断事物及自我的那些价值标准、审美标准和政治信仰等,均来自先于我们并构造我们的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支撑我们人生追求的信念之源。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建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同一而反复的关系,意识形态召唤并建构了主体,同时主体又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22]建构主体不仅仅靠对先进分子的表彰、奖励,同时也伴随着对落后分子的批评、批判,我们不难看到,《创业史》中的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收到了批判,《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王菊生受到了批评,《三里湾》中的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受到了批判,《锻炼锻炼》中的陈聚海受到了批判,《乘风破浪》中的冯棣平、隋波、宋紫峰受到了批判,《百炼成钢》中的赵立明受到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这些落后分子不但受到了上级领导、同级官员的批评,而且还受到了普通群众的批评。普通群众的批判话语与领导的话语并没有多少不同,只不过是更加锐利,更加不留情面。范登高在经过几天的“帮助”之后,支部决定让他在大会上做检讨,可是他检讨的态度不端正,王金生不便发言,这时,几个普通群众站起来对他进行批判。尤其是牛旺子的批判让他百口莫辩,牛旺子抓住了他的要害对他进行了批判,牛旺子从他的财富积累的历史说起,再说到社里给他的利息,他不但不是给社里的恩典,而是农业社对他的恩典,因为如果他再不入社,他就要被开除出党,这彻底击垮了他的优越感。同样,普通工人的批判让宋紫峰接受不了,宋紫峰的检查因为不够深刻一连三次都没有过关,他的情绪很低落。让普通群众批评领导,不但可以制造一个干群平等、群众可以参加国家事务的想象性满足,而且更让这些领导的颜面尽失、尊严扫地,让他们的主体性消失殆尽。

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让普通群众过上和平幸福的世俗生活,意味着“世俗幸福成为历史必然性前景”,^[23]因而,革命一旦胜利便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了避免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让普通群众继续保持革命精神。开会是让普通群众继续保持革命精神的重要方式,开会就成为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开会为普通群众的

日常生活嵌入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十七年文学对会议的书写也使十七年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既给十七年文学带来了曾经无比的荣耀,也给十七年文学带来了艺术的缺陷。会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不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关键是如何进入,如何呈现会议。会议应该成为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成为情节的一部分。当然,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也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会议场面的描写,见出了中国新一代群众的形象。正是通过开会,作家塑造了聪明干练、深明大义的王玉梅,聪明能干、机智善良的王玉生,顾全大局、先人后己的王金生,精明能干、心性高强的邓秀梅,稳重幽默、平易近人的李月辉,懂业务、讲科学的宋紫峰。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为十七年文学带来了非常独特的印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新时期以后,文学逐渐远离了政治,文学开始表现诗意的生活,会议因为缺乏诗意的光辉在文学中不见了踪影,不过,如果要反映建国后那一段历史,会议仍然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被文学遗忘,而十七年文学在会议书写方面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20 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转折,这段历史时期应该得到文学的回应,十七年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反映了那个时代。“40 至 70 年代主流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党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做出诠释,它也就成为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审美读本。我们不否认那个时代作家的理想主义真诚,但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个人体验从属于政治理念、组织规范的文字,其对历史事件、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性。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文学普遍缺乏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美’。”^[24]十七年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对生活的集体想象,“集体想象虽然是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产物,但也有人民逐步自发形成的愿望与情感积淀于其中,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以其独特的经验融入其中,既分享集体想象,也给予集体想象以真实的愿望与情感基础。”^[25]新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转折,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心理焦虑与不安,十七年文学总是以光明的未来给群众以美好的允诺,借以抚慰群众的焦虑与不安。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日常经验,从一个侧面折射了重大的社会变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提供了那个时代人们较为真实深刻的心理变化镜像,为那个政治性的时代提供了形

象的注脚。

〔参 考 文 献〕

- [1] 张清华,王月峰. 演讲话语之于革命叙事[J]. 文艺争鸣, 2002(5):37.
- [2] 吉尔·德勒兹. 什么是哲学[M]. 张组建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93.
- [3]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367.
-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1.
- [5] 赵卫东. 三里湾隐形文本的意义阐释[J]. 学术月刊, 2005,(1):84.
- [6] 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M]. 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6.
- [7] 谢有顺.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伦理[J]. 学术研究, 2016(4):156.
- [8] 周立波. 山乡巨变[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9] 董之林. 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71.
- [10]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政治学的反思[M]//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62.
- [11] 闫薇. 1950—19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研究[M].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09:56.
- [12] 童强. 空间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347.
- [13] 陆扬. 文化研究概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124.
- [14] 陈永国. 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前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5.
- [1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92.
- [16]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104.
- [17]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27.
- [18] 蔡翔.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9.
- [19] 赵树理. 赵树理文集[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0:498.
- [20]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83.
- [21] 李杨.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152.
- [22] 孟登迎. 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35.
- [23] 许纪霖.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117.
- [24] 杨联芬. 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2):33.
- [25]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69.

(责任编辑:程晓芝)

A Study on the Conference Writing of the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ZHANG Wen-nuo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iberated area literature, the conference has entere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orld.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as a grand narrative, is a narrative of legitimacy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presents a large number of meeting scenes, forming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literary writing. The conference writing i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has brought a very unique mark for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which truly reflect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life in China from 1950s to 1970s. The conference writing i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spiritual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from one side, and provides a mirror image of people's real and profou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at that time, which provides an image footnote for that political era.

Key words: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Conference ; Writing